

2014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

臺大歷史系參訪團

編按：

2013 年 5 月，本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以下簡稱早大）台灣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協議，雙方協定於 2013-2015 年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包含學生交流與教師交流。2014 年 7 月 26-30 日，本系呂紹理老師與陳翠蓮老師帶領 22 位同學前往該所進行第二年度之講座交流活動。

本次行程五天四夜，第一天為早大校園導覽與歡迎會；第二天分組參訪憲政記念館、國會議事堂、靖國神社、遊就館及江戶東京博物館；第三天由專人導覽早大中央圖

書館，之後在國際會議場舉行集中講座，由紀旭峰（早大アジア研究機構台灣研究所常勤次席研究員）、安藤丈將（武藏大學社會學部准教授）與木下ちがや（明治學院大學非常勤講師）三位老師發表有關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主題演講，並有小型討論會。第四天則是早大同學陪同本系同學參訪東京及近郊史蹟。

本文為上述三位老師演講摘要及此行部分參訪學員的心得節錄。照片由參訪學員提供，不另註明，謹特此致謝。



▲2014 年 7 月 26 日交流首日，本系師生抵達早稻田大學，與若林正丈老師（前排右四）在大隈講堂前合影。



學術交流

紀旭峰老師主講：
大正時代東亞知識人的交流
——以組織團體及出版活動為線索

紀旭峰老師從大正時期的各種政治結社、交流群體與出版活動切入，來談東亞各地知識人的互動與交流，以及從中產生的啟蒙、刺激、摸索與亞洲想像。

山室信一曾說：「日本成為知識的結集據點，提供來自亞洲各地知識人接觸的機會。透過如此的接觸，形成思想連鎖及亞細亞共同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紀旭峰老師藉此說明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朝鮮、臺灣、越南等地的知識青年往日本移動、學習，或如孫文、梁啟超等人赴日從事政治活動，促使日本成為超越國家、民族的亞細亞的組織據點。

針對這個現象，紀老師提出三個問題意

識：為何發生於大正時期？為何是在日本？這時的臺籍留學生有什麼共通的特徵？

第一是時間點。1904-1905 年的日露戰爭（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為戰勝國，獲歐美國家重新評價，進入國際舞台，大正時期可說從此時到 1920 年代中期，或至滿州國建立為止。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來談，大正時期從民主化開始，分成三階段：「國民化」即富國強兵，「社會化」即原敬內閣（1910-1924）下的民主思想發展，「帝國化」即巴黎和約簽訂後，列強決定改變殖民地政治的制度。大正後期的日本開始出現許多社會改造的言論，如吉野作造提出「民本主義」，另有「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思潮出現。這些言論雖然方向不同，相互抗衡，但也互相尊重，同時將日本推向改造的方向，整體的群眾運動難以明確定位為左翼或右翼。這股百家爭鳴的風潮大致維持到大



▲2014 年 7 月 26 日，早大舉行歡迎晚會，雙方師長互贈紀念品。左圖：本系呂紹理老師與若林正文老師（左）；右圖：陳翠蓮老師與梅森直之老師（左）。



2014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

正十四年(1925)「治安維持法」施行為止。

第二是地點，為何各地的啟蒙不是發生於該國內部，而是在日本？紀老師認為此時各地高等教育尚未健全，如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 1928 年，在此之前，臺灣各地學生只能赴日本留學。對當時仍屬日本殖民地的臺灣與朝鮮的知識人而言，透過赴母國留學所引發的可能性相當多元，例如吸收殖民地所欠缺的、更為高深的知識，包括政治學、法學等專門領域，的確是不得不然的選擇；再者，從留學內地所遭遇的差別待遇與制度中，知識人亦得以重新認識自我與他者。

在日本，各地知識人形成後藤乾一教授所謂的「橫向網絡」，即除了日本人的幫助外，各區域留學生也相互協助、聯繫。在這個橫向與縱向的網絡中，日本居於引進西方新知來源的樞紐。

在「接觸領域」(contact zone)的概念下，接觸者與被接觸者的界定，會因所處空間變化，以及知識傳播方與接受方的不同，而有身分上的轉換。近現代日本大學，實即扮演文化交流的接觸空間以及與各地知識人交涉與相遇的場所。留學生在當時的內地，屬於知識傳播中的接受方，學習日本新知；與日本知識人交流時，轉為被接觸者；回到故鄉，則成為母國青年知識人的新知來源，為新思想與知識的傳播方，其角色一變而為接觸者，當地居民則成為被接觸者。

由於身處空間的變化，留學生觀察事物的視線與座標軸亦會改變，視野從故鄉層次逐漸擴大到亞洲甚至世界，在追求學問、反省自我認識與擴大視野，從而建構知識的實

踐與群體交流網絡。

紀老師接著從人群的視角進行分析，指出當時知識分子的交流媒介為教會。例如主持蔡培火受洗典禮的植村正久，隸屬於富士見町教會，曾替大隈重信施洗，創辦《福音新報》。透過教會，植村正久與蔡培火成為臺日知識分子的人際網絡中心，當時臺灣的士紳和留學生，如李春生、林獻堂、蔡惠如、黃呈聰、林呈祿等人，得以認識安部磯雄、吉野作造等日本「基督教系知識人」。此外，《福音新報》也提供知識人發表言論、思想交流的平台。

當時日本社會普遍對於北進態度較積極，報章雜誌上較少提及臺灣現況，〈臺灣人民之要求〉(《福音新報》1336 號)為首篇介紹臺灣的文章。該文內容觸及中小學教育、議會設置、高等人才的運用和鴉片吸食政策等問題，紀老師推測可能為蔡培火主筆，或執筆者深受蔡培火思想所影響。

此外，我們可從結社、出版等活動，觀察亞洲知識人在東京的交流與合作，例如中國留學生馬伯援創辦的「聲應會」(1919 年



▲紀旭峰老師主講「大正時代東亞知識人的交流」
(2014 年 7 月 28 日攝於早大國際會議場)



學術交流

改為「啟發會」)，屢有朝鮮人、臺灣人的活動身影。臺灣知識分子積極與在日朝鮮人尋求合作，藉由東亞同盟會、亞細亞學生會、曉民會等組織，展開交流與往來；並透過與朝鮮人鄭泰玉、柳泰慶的互動中，獲得朝鮮人主辦刊物的投稿機會，諸如《革新時報》、《青年朝鮮》與《亞細亞公論》。這類刊物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亞細亞公論》（後改名為《大東公論》）。此刊物宗旨在於以人類主義來喚醒亞洲人，尋求亞細亞和平；文章包含中、日、韓三種語文，主題跨越政經、教育、宗教與社會，後期還有來自印度的英文投稿（Rash Behari Bose），此即打破單一語言、國家的新嘗試。臺灣學生的投稿主題多半關注「破除內臺差別」、「亞洲的將來」，即肯定殖民地自治為要務，而非立足被統治者內部的階級矛盾，是以可將臺灣投稿者的立場界定為「資產階級」和「民主主義」。

在殖民地自治的主張外，蔡培火論述「極東是極東人的極東」，此非「亞洲門羅主義」式的排外思想，而是受到基督教信仰影響下，認為極東地區的糾紛係由極東人自身所釀成，故不可將責任轉嫁他人，此可謂「亞洲人的自省」。而王敏川則提出爭取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地位平等的目標，認為朝鮮民族、日本民族與漢民族須協力負擔文化指導的任務。

紀老師最後總結道，《亞細亞公論》雖然僅發行 9 期便被迫停刊，但這份刊物跨越單一國家、民族的界限，成為亞洲知識人交流的場域，足以使吾人反思在不同的歷史教育與記憶下，面對「如何共有歷史」的問題。

安藤丈將老師主講：

1980 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運動的發展

木下ちがや老師主講：

日本 2011 年 311 地震後的社會運動風潮

安藤丈將老師從「民主主義的潮流」、「民主主義的赤字」及「社會運動的社會」三個概念切入，講述日本的社會運動史。他指出，二次大戰以後，全世界採用民主制度的國家雖然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但這些國家的選舉投票率卻每況愈下，顯示公民對選舉的信賴度持續降低，紛紛面臨「民主主義的赤字」的危機。

安藤老師以「民主主義的赤字」作為關鍵詞，來把握東亞各國的民主主義的狀況。臺灣、香港、日本在 2011 年分別發生國光石化抗議事件、菜園村迫遷，以及 311 東日本大震災之後的反核運動，這些抗議事件主要的核心價值，不僅是對於選舉的不滿，亦為追求更深層的民主價值。臺、港與日本，長久以來作為已開發國家的優等生，奉行以經濟掛帥、民主主義次之的政策為立國價值，卻同時面臨高齡化、環境破壞與產業結構變化的困境，反對運動應運而生。這反映即使追求經濟發展，卻仍有拚經濟無法解決的問題；亦顯示現今執政者仍以過時的國家發展模式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石化業、核電、高鐵等建設，都是上述過時政治主張的典型例證。

而來自歐美的「社會運動社會」的概念，以 1990 年代社會運動的制度化為開端，



2014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

媒體、國會等機關對社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也能反映社會運動的各種議題。從這個概念來觀察，可以發現日本的社會運動（例如環保、反核運動）並沒有像歐美一樣走向制度化。雖然制度化只是選項之一，但日本社會運動的侷限主要緣於戰後的新左翼運動，追求的是屬於自己的人生與處世哲學，而與政治保持了一定距離。此外，日本的社會運動分子，一開始並沒有想要進入體制內（在國會選舉上獲勝），而是藉參選以宣揚其理念為主，儘管後來有所修正，仍難以真正進入體制內。社會運動究竟要不要進入體制內，或只是把選舉當作一種手段？參加太陽花運動的領導者往後也會面臨類似問題。

安藤老師認為社運會留下看得到的改變（如制度、法律），與看不到的改變（觀念、想法、生活方式），即使沒有取得立法方面的成功，也不能說是失敗。不過就他的觀察，日本社會似乎過於著重後者，而與制度法律的連結不夠。

木下ちがや老師則從日本自身運動的發展與亞洲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發展加以比較，他提到戰後日本國內對安保條約不滿，部分民眾發起反抗活動，希望喚醒多數人的關注。之後的日本雖然也有其他的社會運動，但相對於臺灣、韓國或中國等地，社運力道卻開始減弱。2000 年後，小泉內閣展開一連串措施，拉大日本貧富差距，加深社會矛盾；至 311 大地震後，日本的社會運動才又活躍起來。臺灣在 2014 年 3 月的太陽花運動，則提供社會運動應該如何「呈現」的另一種參考。

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在各種運動中，我們會看到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可能明確掌握未來動向。東亞各國彼此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但摩擦也越來越大，同時交流卻又同時增加。種族歧視問題、歷史問題等的探討，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以民眾為主的社會運動在今日，事實上不可能消失。



▲安藤丈将老師、木下ちがや老師（右）主講（2014 年 7 月 28 日攝於早大國際會議場）



學術交流

李鎧揚（臺大歷史系 D00 博士生）

對於臺灣年輕人而言，日本是一個充滿現代感又富有歷史美感的國家；對老一輩的臺灣人來說，日本曾經是他們的母國。對臺灣史的研究者來說，日本統治的 50 年，是臺灣大規模近代化的重要時代，不論我們是否肯定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人離開後，留下許多文物與精神，成為臺灣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在臺灣處於戒嚴時期及後戒嚴時代，日本也是臺灣史研究的重鎮之一，培育了許多出色的臺灣研究學者。

早稻田大學從 1882 年設立（前身為東京專門學校）至今，許多影響亞洲歷史的人物出身於此。被後世譽為中華民國憲法制訂者張君勱，在 1906 年便以清國公費生留學該校政治經濟學部。1920 至 1940 年代間，為數不少的臺灣人曾經留學早稻田，例如前臺灣省民政廳長楊肇嘉、《臺灣人四百年史》

作者史明、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以及獲選 1931 年日本甲子園最有價值球員的嘉農棒球隊臺籍選手吳明捷，都是早大畢業生。1945 年戰後則有徐重仁、羅福全等人畢業於該校。

我曾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師生於 2009 年夏天前往廣島大學修習「暑期密集課程」，接觸的大多為日本或臺灣的教授，並未與該校學生進行討論，之後雖然和日本同學有所接觸，但都僅限個人交流，沒有較具規模的互動。2014 年的早稻田大學參訪行程，實為交流的好機會。我本人也有幸獲選本次活動的助理。

這次參訪，最吸引我的是本次早大課程由三位教授擔當。首先由紀旭峰老師講授大正時期學生「立身出世」之路。臺灣在 1895 年成為日本領土後，許多乙未世代出生的人選擇到「內地」（日本本土）留學，如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接觸到比島內自由的空氣。在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臺灣，這些留學生帶來的知識成為對抗總督



▲2014 年 7 月 28 日，於早大國際會議場舉行集中講座及討論會，由梅森直之老師（中）與若林正文老師主持，左一為平井新同學，擔任口譯。



府的武器之一。即使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多數臺灣人仍選擇留學日本本土。

安藤與木下兩位老師討論問題時，雖然多以日本為對象，該議題的延伸性實可與其他國家一同思考。例如，當國家為了追求經濟發展但無力解決發展帶來的污染，並犧牲少數人利益時，被壓迫者如何透過合法或其他手段告訴政府與既得利益者這樣是不對的，並尋求改革方式。特別是亞洲地區國家，追求經濟發展時，往往同時追求民主改革。兩位老師的演講，讓我不禁以戰後臺灣的發展過程加以思考。

解嚴以前，除了少數人以反對國民黨統治為訴求展開反對運動外，多數人對於環保、社會福利、勞工權益等議題的關注，至解嚴後才有所發展。從世界人權發展歷史來看，臺灣的第一代公民與政治權利長期遭到壓制，而第一代人權與第二代經濟社會權發展有高度的時間重疊，導致多數人更加忽略環境、民族自決等第三代人權。政府雖然迫於壓力，著手推動一定的立法，但在人權價值核心尚未建立下，許多法案對於民眾的保障不足，也不知如何修正。

本次主講老師皆談到亞洲鄰國面臨的各種複雜問題，在臺灣，我們也常常被指責不夠關心國際事務，我對這樣的指責並不否認，但也不是完全贊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並不能選擇要收看什麼樣的媒體，即使現在網路如此發達，臺灣仍有一定的民眾依賴報紙與電視取得資訊，真正決定民眾要看什麼的，其實是這些媒體核心理念的「展現」。也就是說，我們取得非主流資訊的代

價很高，當這些媒體擁有特定意識，民眾易暴露在洗腦的風險中。對於國際化不足的問題，最需要指責的就是臺灣主流媒體。我們除了呼籲大家多利用網路資訊外，也應該理解這些新聞想要傳遞的意義、希望塑造出擁有什麼樣價值觀的「公民」。其次，我們的政府對於人權的理解，似乎總認為只要設置機構、建立幾塊紀念碑就足以「大和解」，對第一代人權應如何落實都如此草率，遑論透過社會運動來實踐公平正義。民眾對於國際事務漠不關心，其實仍與臺灣政治社會發展密不可分。

我們很羨慕日本有一定的空間，能讓自己的國民對於政府在第二代、第三代人權上努力不夠時，保有一定的抗議空間。臺灣在表達這些訴求時，往往會被說成「泛政治化」，很多人甚至認為討論公共議題要儘可能保持「中立、客觀」，應該要去政治化地討論。這種見解讓我不禁想到 198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主教 Desmond Mpilo Tutu 的一句話：「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實已經選擇站在壓迫者的一邊。如果大象把它的腳壓在老鼠的尾巴上，而你自認為中立，老鼠是不會欣賞你中立的立場。」如果你承認國民黨的統治在戒嚴時期鋪天蓋地、無所不包，今日在尚未走出黨國體制陰影的臺灣，類似的影響力仍然是強而有力的存在。看看日本，想想臺灣，我們是否應該反思自己為這個社會的各種議題付出了多少關心，一味的自稱中立卻拒絕關心或對任何議題表態，都不過是助紂為虐罷了。



蔡明純（臺大歷史系 D97 博士候選人）

筆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清末民初的中國近代的思想與文化交流，近年因工作與個人興趣關係，對近現代東亞地區，包括中、日、臺灣等歷史與文化交流互動的相關問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此次能以非臺灣史或日本史專業的背景參加交流訪問，與學弟妹及早大師生一起聆聽課程並交換意見，深獲啟發，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校園巡禮

早大著名地標——大隈講堂，是紀念早大創辦人大隈重信所建，1927 年落成，2007 年校慶時曾全面整修過，同年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從早大同學解說得知，大隈重信曾言及想做的事情太多，可能需要活到 125 歲才能完成。因此「125」這個數字在早大格外受到重視，例如大隈講堂的高度是 125 尺，早大於 1963 年舉行大隈重信 125 歲誕辰紀念活動，2007 年舉辦創校 125 周年校慶。

令我印象深刻且好奇的是，早大並沒有校門，校園亦無圍牆。早大同學說明，早大辦學精神著重追求知識、學問的獨立，因此將學校規劃成開放型大學，象徵早大學風的自由與開放。

早大各個校區皆有不同圖的圖書館，早稻田校區的中央圖書館相當於臺大的總圖，藏書在兩百多萬冊以上。此行有專人導覽各樓層，介紹館藏貴重資料，如《岡松參太郎文

書》與《鴻跡帖》，前者屬法制史與法律學的重要史料，特別是臺灣在日治時期舊慣調查會的組織與運作、法案起草與審查，以及日治臺灣統治體制的改革紀錄；後者為 1905 至 1910 年間早大清國留學生部的相關史料，包括卒業學生名簿、留學章程等。

中央圖書館的閱覽座位，有開放式及個人閱覽室供同學使用。個人閱覽室類似本校總圖的研究小間，無申請身分限制，只要有空室，師生在櫃台登記後，享有一整天的使用權，每天閉館前歸還圖書並遷出即可。反觀本校研究小間申請程序繁複，且只限老師與博班學生申請。筆者認為，未來本校總圖在檢討研究小間的使用規則時，或可參酌國外大學的相關措施，方便讀者使用。

講座後的討論

集中講座結束後，主持人若林與梅森老師引導早大與臺大同學討論。本次授課主題偏重在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與臺灣 318 學運有相呼應之處，因此討論內容較多著眼於 318 學運之後的情勢發展，以及臺日兩國的反核議題。在座不少系上同學，學運期間參與聲援活動，除了立法院前靜坐之外，推動自主罷課連署、舉辦野台演講，或在學運落幕後主動參與收集現場史料的工作，故談及學運經過與未來展望時，提出的觀點與回饋相當熱烈。或許學運對早大同學並非實際且切身的經驗，這部分的回應較為不足。此外，談到反核議題，有早大同學指出，日本反核聲浪其實存在各種不同意見，並非全然反對使用核電，有些人是因為政府提供的資



訊並不透明，而質疑核電廠的安全性。

校外見學行程

校外見學行程，參觀靖國神社、遊就館、國會議事堂、憲政記念館與江戶東京博物館。筆者來日十多次，上述各處都是初次造訪。遊就館的命名，源自荀子的〈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之中的「遊必就士」之意。館內陳列展覽以戰爭與近代日本為主題，展廳以古代、近代、明治維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日清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大東亞戰爭為序，展出每個時代的戰爭中日本使用的武器、軍人遺物、遺照、戰時資料等相關資料。

憲政記念館最初的成立目的，是為了使民眾對議會制度與民主主義有基本的認識，了解二戰前的議會政治家與藩閥、官

僚、軍部及貴族院等非民主的政治勢力抗爭過程中，日本的議會制民主主義如何發展，像是護憲運動、政黨內閣以及制定普選法等重要歷史事件，以及議會政治家們的成就。

以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其再現的歷史，往往是在權力的詮釋、操控下，呈顯出某部分的面向，而非全貌。參訪遊就館與憲政記念館即可發現，館方如何以經過選擇的展覽、史料、文物陳列，詮釋日本自身從幕末維新以降的近代歷史之發展過程，進而傳達給觀展的日本民眾某種特定的史觀與歷史記憶。例如遊就館的美化戰爭、避談侵略與戰爭責任，並將日本塑造為戰爭的受害者；而憲政記念館的展示大部分著重在政黨與議會政治家的光輝、成就，未呈現出當時所謂「民主」與「議會政治」的問題點與局限，殖民地臺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國



▲2014年7月28日，本系師生於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前合影，大門上的題字“QUAE SIT SAPIENTIA DISCE LEGENDO”是拉丁文，意為“Learn by reading what wisdom is.”



學術交流

民在憲政、民主主義議會政治中的角色，皆未在館展中獲得突顯。

參訪之後的展望

在筆者博士論文所關注的晚清旅行文化議題中，知識分子以往多透過新知與舊說所編寫成的世界史地相關書籍，如林則徐的《四洲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國圖志》等，來構築各自對西方列強與世界各國的基本知識。但隨著當時中西交流與衝突的漸趨頻繁，為了拉近「想像中的自我與他者」以及「現實中的自我與他者」的差距，通過「出洋遊歷」，實地獲得知識與親身經驗，成為越來越被強調的課題。從早期的外交官派遣駐外，兼及遊歷各處、蒐集外情，到傅雲龍等十多位遊歷官出洋，撰寫關於歐美日各國的調查報告，及至庚子後新政施行之際，大量派遣基層地方官與仕紳，以官費或自備資斧的方式，鼓勵知識階層赴日考察政法、教育、兵刑等，晚清的海外遊歷，可謂頗富「見學」內涵。日文的「見学」意為「親身所見到的實地知識」，在舊學新知交替的晚清，現代意義的「旅行」，在意識與經驗上仍處萌芽之際，「旅行」與「見學」兩者關係往往密不可分。此番的參訪與交流，也提供我在思考「旅行」與「見學」的課題上，有了與以往不同的體悟。離開原本所處的位置，才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與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事與國家，即使是同一個國家，例如日本的關東、關西、東北地區，地域間的文化與慣習亦有差距，無法一概化約而論。

何得中（臺大歷史系 D00 博士生）

從事臺灣史研究者皆知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歷史關係密切，特別是臺灣在 1895 年後曾經為日本統治五十多年之殖民地。雖然日本殖民時代在半個世紀前早已結束，但它的遺存仍是現代臺灣重要的部分，無論從臺北市或金瓜石的建築物中，或是許多臺灣人的舉止與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仍表現出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留下的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很多人認為今日臺灣社會對於殖民統治當局的想法相當正面，尤其是相較於東亞其他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如韓國及中國。

身為戰後第二代德國人的我，很慶幸自己和今日臺灣大部分年輕人一樣，在一個既和平又富有的環境下長大，但在尋找自己的認同時，不得不面對過去的歷史困境。我曾從事國際關係的研究，對於觀察一個國家如何看待錯綜複雜的過去，及其面對和解與「修好」(rapprochement) 的議題特別感興趣。因此，這次參加早稻田大學參訪，我最想觀察臺灣和日本兩國的老師與同學們將如何互動，或特別想要跟對方討論和分享的想法有哪些？當然，年輕學者交流本身就是長期和解過程的重要部分，它也一定有助於增進彼此了解。

第三天講座研討會時，臺大與早大師生對彼此的好奇越來越明顯，且樂於分享與進一步交流。此次集中講座主題為戰後日本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早大梅森直之教授和若



2014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

林正丈教授的引言之後，安藤丈將老師介紹戰後日本的社會運動，木下老師以「日本之社會運動現狀」為講題。這兩個演講皆強調日本公民社會的背景，並且試圖解釋日本大多數過去與現代的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課後安排臺大跟早大同學兩個半小時的討論。同學們以母語發言，但透過老師與助理的努力，使雙方能夠經過溝通而互相理解。

早大同學對於3月太陽花學運相關的第一手資訊特別感興趣，因為這次的學運顯示臺灣解嚴二十幾年後公民社會已有如此活力。且日本同學和學運主要參與者的年紀相近，他們也想要趁機了解當時臺灣學生為何不滿政府與中國簽訂服務貿易協議，以及學生佔領立法院事件的細節。

這次學運讓已在臺大唸書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它證明臺灣社會對現代年輕人

普遍「不關心政治」、無法忍受挫折的「草莓族」等負面評價是錯的。我很樂意再次聆聽臺灣同學分享參與學運的感想、回顧及評估活動的優缺點，以及如何面對社會與家人不同的反應，還有某些媒體的誹謗，最後則與日本同學分享他們認為在未來有哪些發展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這次交流活動不僅是了解對方的一個好機會，也讓大家分享如何改善社會的個人經驗跟態度。對我個人而言，這也就是每一個人，無論是否為學者，最重要的追求目的之一。雖然尊重不同意見與看法的存在應是每一個民主國家社會內在的特徵，但看到年輕學生與學者跨境交流並分享這些想法，很有意義。



▲2014年7月28日，集中講座於早大國際會議場舉行



學術交流

張純芳（臺大歷史系 D01 博士生）

初抵早稻田大學當晚的歡迎會十分熱絡，梅森直之、若林正丈老師與本系呂紹理、陳翠蓮老師先後致詞，拉開活動序幕。同學彼此自我介紹，用不流利的英日文對話，拉近彼此距離，是相當有趣的體驗。

第二天的行程是校外參觀，我將之命名為「日本民主運動史巡禮」。我們一行 20 人分成兩組，分別前往憲政紀念館、國會議事堂、靖國神社、遊就館及江戶東京博物館。憲政紀念館隸屬國會，以電影和史料方式介紹國會歷史。早大創辦人大隈重信，是推動日本憲政發展的重要人物，提出政黨內閣制、制訂英美式憲法、開設國會等建議。1898 年，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攜手組成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隈板內閣」。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戰死的日本軍人及軍屬，多數

是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陣亡日軍和臺灣高砂義勇軍。遊就館位在靖國神社內，成立於 1882 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軍事博物館，陳列日本近代戰爭中的武器、軍人遺品、戰時資料等 10 萬件。

江戶東京博物館是介紹江戶時代與東京歷史文物的博物館，入館迎面而來的是巨大的日本橋，乃江戶最早的發跡地與經濟命脈。走入江戶東京博物館，彷彿走入歷史隧道，象徵國力的江戶城、熱鬧的歌舞伎座、街上人群熙來攘往，展現市井小民旺盛的生命力。再進入明治昭和時期，感受西方文化的進駐，擁有日本第一座電梯的凌雲閣，以及各種國產和外來進口車，象徵科技的進步。日本軍事現代化和國力的擴張，無可避免走向戰爭，美軍在東京和橫濱投擲炸彈，令人怵目驚心。關東大地震遺留下的殘骸，讓人類反省自身的渺小和科技的侷限性，我們除了應該學會與人相處，也應該重視自然生態，珍惜現在得來不易的和平。

回顧一整天的參訪地點，好像時光倒流般，從最接近現代的民主階段走向階級明確的江戶時代。憶及之前看過的一部電影《反安保：藝術之戰》，得知日本的民主不像臺灣是人民由下而上爭取得來，而是政府由上而下賦與民眾。於是我很好奇，日本人中，特別是大學生，怎麼看待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這個疑問到第三天有了解答。

第三天是這次交流活動的重頭戲。早上參觀早大的中央圖書館，之



▲2014 年 7 月 27 日參觀靖國神社



後前往會議廳上課。紀旭峰老師首先介紹大正時代東亞知識人的交流，早稻田和明治、中央大學作為早期民主思想的啟蒙地，提供臺灣和朝鮮知識分子學習民主的機會和發表言論的場域。下午的討論由梅森和若林老師擔任主持人，在簡單的開場白後，如民主接力般將棒子交給安藤丈將老師。著有『ニューレフト運動と市民社会：「六〇年代」の思想のゆくえ』（《新左翼運動與市民社會：60年代的思想去向》）的安藤老師是政治社會學家，擅長東西方比較研究。他從臺灣的國光石化抗議運動、香港的高鐵爭議出發，探討日本反核事件，並援引歐美制度化理論分析日本反核失敗的原因，最後歸結出三點：黨中分裂、議題單一、選舉問題。

接著由木下ちがや老師主講。木下老師研究警察制度，長期參與社會運動。1960年反安保運動以失敗收場，日本人逐漸被規訓、整合成一股推動經濟力向上的力量。2011年日本經歷311大海嘯後，福島核能災害喚醒日本人的危機意識。同一年世界各地發生各種抗爭運動，如阿拉伯之春、美國華爾街佔領運動等，日本人自覺似乎能做些什麼。但是反核此類社會運動不只危及既有制度和政府，也被視為動搖社會根本之舉。像日本這種重視社會紀律的國家，社會運動無疑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反核的雙刃性，是反核運動難以成功的主因。也許反核的結果會像反安保一樣，但是對社運分子來說，當他們面對無力阻止又深感恐懼的政策出現後，反對將不只是一種阻撓的手段，更是一種延續信念的方式。

問答時間，梅森老師向臺日學生丟出一個問題：雙方對太陽花學運的看法。與臺灣參與運動多為20出頭的年輕人不同，日本社運分子以30到40歲、有社會經驗和歷練的成年人為主，加上在座不少臺大學生親身投入318學運，回應顯然較日本學生熱絡。日本學生直觀的反應是：「臺灣學生為什麼這麼拼命？」作為20後30初的我並不意外，當時看到新聞的第一反應也是如此，即使歲數相差不多，同樣是一個世代的差異。但我有不同見解，這種見解必須是走上街頭，而非透過電視媒體才能發現。媒體往往聚焦於抗爭和靜坐學生，當你親臨現場時，會看到外圍有另一群人，只是走馬看花式地看熱鬧，他們也多为十幾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我不認為這群臺灣學生跟日本學生有多大差異。不同世代自然有所分歧，同一世代也不應該化約為一個整數，這是我的淺見。

第四天分四組活動，我私下戲稱所屬的鎌倉組為「老人組」，除了成員以博士生居多，參訪景點也以寺廟古建築為主。由早大學生帶隊，我們先後參觀鶴岡八幡宮、極樂寺、成就院、高德院大佛、由比ヶ浜海邊。感謝早大學生的解說，我在八幡宮解籤，在極樂寺得知水子由來，在高德院了解大佛歷史，午餐還吃了鎌倉特產三色丼。傍晚回到早稻田，早大學生為我們舉辦送別會，除了錄製感人的影片外，還送我們鎌倉筷子和卡片為餞別禮。很謝謝早大的盛情款待，這是一次非常寶貴的交流經驗，希望能持續下去。



學術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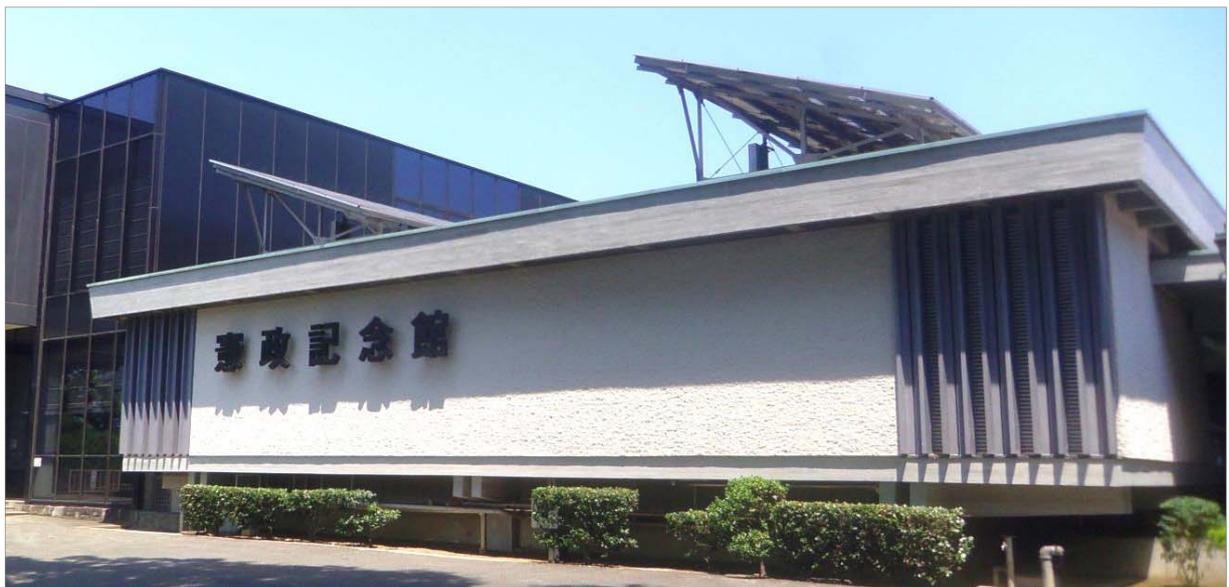
郭婷玉（臺大歷史系 D01 博士生）

這次行程第一天熟悉早大校園環境，第二天到靖國神社、憲政紀念館、江戶東京博物館等地參訪，初步瞭解日本近代政治發展，第三天為學術講座與討論，第四天則與早大學生一同深度參訪東京都市景點。藉由這樣的安排，我們由淺入深地瞭解日本近代政治研究與臺灣史的關連，亦擴大與日本學生之交流。

第二天（7月27日），第一站到靖國神社。每年接近8月時，日本、韓國、中國圍繞著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的爭端，總會讓此處成為政治風暴中心。臺灣雖然也是日本帝國發動大東亞戰爭的一環，除了前幾年國內某政客藉原住民團體喧騰一時外，鮮少介入參拜爭議。究其原因，也許臺灣在戰後對日本

殖民時期歷史的評價與認識都頗為模糊，以致未曾從自己的立場思考歷史爭議。作為一個歷史學徒，我瞭解靖國神社參拜爭議是歷史與現實國際外交角力混雜的問題，不會貿然判斷參拜爭議之對錯。但是，暫且除去歷史、政治的紛擾，有部分臺灣人曾經作為日本國民，為「國」參戰，陣亡後被共祀於神社中，仍是不爭的事實。

靖國神社旁即為戰爭博物館——遊就館，該館性質有些類似神社之資料館，常設展覽為日本近代對內、對外各個大小戰爭之起源、過程及戰後結果。2014年適逢1943年日本發起「大東亞戰爭」70週年，館內設置「大東亞戰爭七十年」特展，展示日本軍隊當時在中國、菲律賓、太平洋群島等地作戰的遺物，鉅細靡遺地介紹在那場戰爭中，帝國內部從軍隊到學生、不分男女老少全體動員過程，也提及日本軍隊海外作戰逐步潰敗，終在1945年美軍登陸沖繩、號稱日本



▲2014年7月27日參訪日本憲政記念館



帝國本土首次被戰火波及一事。然而，關於「沖繩上陸」，展覽只說日軍如何抵抗登陸美軍、多少沖繩民眾在戰爭中犧牲，卻隻字未提日軍在投降前，為免沖繩人被美軍吸收成「間諜」，竟下達「玉碎令」，要求日本駐軍殺死琉球人，或由居民自殺「殉國」等所作所為。沖繩在 1870 年代被日本納入版圖前曾是獨立的琉球王國，日軍擔心被沖繩人背叛並非空穴來風，但這絕不表示日本軍隊在戰爭中可以對理應是自己國民的沖繩人犯下戰爭罪行，更不等同日本政府有權在戰後面對全體國民的公開展覽中刻意隱瞞這段歷史。這樣的隱蔽心態，無非為維護政權合理性，而以「國家戰爭」之名義掩蓋犧牲者複雜的異質性。沖繩在二戰末期慘痛的歷史被刻意遺忘，與臺灣社會對二戰後初期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自身歷史之疏遠，頗有可資對照之處。如何面對歷史傷痕、避免慘痛再次發生，也是兩個社會必須思考之問題。

第三天是關於日本近代社會運動的集中講座，分別以 1920 年代東亞知識人在東京之交會、1980 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 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後的社會運動風潮為主題。會後的共同討論中，臺大學生分享臺灣今年 3 月的學運經驗。

經過一整天對日本近代至今社會運動發展歷史的理解與討論，加上個人長久以來接觸日本政經文化新聞之經驗，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和臺灣人相比，日本人對生活中的政治參與、政治權力爭取相當疏離，影響成因為何？以此問題就教於早大師生，幾位參與會談的日籍老師據其研究成果表示，日

本社會於 1960-1970 年代安保鬥爭後，對社會運動有「激烈」、「暴力」之刻板印象，是讓民眾將政治參與排拒於生活之外的原因之一。幾位日本年輕學生也從自身的政治參與經驗，指出日本民眾普遍具有「將政治交給有經驗的菁英官僚負責」、「不願意以抗議方式給其他人帶來麻煩」、「不覺得親自行動能改變現狀」等認知，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對政治產生疏離感。

正因如此，日本年輕學生對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之臺灣民眾願意投身 3 月學運感到驚訝。此次前往交流的臺大學生，多半曾以不同形式親自參與 3 月學運，對於早大學生提出為什麼有那麼多臺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學生，關心國家政治問題、身體力行參與行動之問題，多名臺灣學生討論後，得出如下的基本答案：

1. 3 月學運主要起因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爭議，通過後可能對臺灣經濟、產業產生衝擊，進而不利正要或未來投入就業市場之學生求職。基於自身經濟利益被剝奪之虞、憂心臺灣產業結構穩定，而向政府抗議。

2. 政府通過服貿協定的手法，讓民眾感覺沒有被充分告知利弊（亦即「黑箱」作業）、未經產業衝擊評估，更違背民主政治運作。為維護民主體制運作，表示反對。

3. 服貿爭議背後，存在「臺灣與中國是否要有更進一步經濟及政治統合？」之根本問題，甚至對某些臺灣人來說，等同討論臺灣的統獨問題。針對這個問題，越來越多臺灣人傾向不認為自己與中國是同一國



學術交流

家，特別是 1990 年代臺灣民主化後出生、接受本土化教育之年輕一代學生，視臺灣意識為理所當然，易於排斥政府施行被視為「加速傾中」的舉措。

透過上述對彼此社會交互詰問與討論，無論是臺灣學生或日本學生，都更瞭解對方社會之社會運動現況與潛藏問題，也藉由比較其他社會現況而更加清楚自身社會現狀的成因。兩個小時的共同討論時間，就在雙方學生熱烈交談中度過。

歷經兩天密集的學習和討論後，第四天學員分成四組，與早大同學分別到各自規劃的地點深度參訪，我所在的小組選擇到東京附近的橫濱。橫濱是國際大港，19 世紀中期影響日本近代史甚深的「黑船來襲」、「開港」等歷史事件，就發生在這裡。也因為是大港

口，19 世紀以來有許多中國人、臺灣人到橫濱發展，於是形成繁榮的中華街，其中還有天后宮跟關帝廟。對我們來說，來到日本社會，體會了一連串熟悉又陌生的文化衝擊，在異地遇見自小習以為常的民間信仰，被以微妙差異之形式重現，即是一例。這一天也是學術交流最後一晚，各組從不同地方遊覽歸來後，出席早大學生舉辦的送別會。臺日學生 40 多人聚在小餐廳中，聊著幾天來的見聞、行程中還沒有聊完之話題，亦互贈臨別感言，溫馨場面，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總結這次參訪活動的心得，我個人在交流活動中確實因臺日學生的共同討論獲得許多刺激，也以自身所見所聞更加瞭解日本社會文化，從而反思自己研究的臺灣歷史問題，收獲相當豐富。



▲橫濱中華街媽祖廟前的牌樓（2014 年 7 月 29 日攝）



張俊麒（臺大歷史系 R01 碩士生）

距今 96 年前，當中日兩國的國民因為山東問題與五四運動而彼此仇視時，有一群人為了兩國和解與提攜，戮力突破劍拔弩張的氛圍，嘗試打下溝通的橋墩——即做為日本大正時代「民本主義」旗手的吉野作造，以及活躍於五四運動並在中國近代史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大李釗等人，在彼此聯絡並了解雙方均認為中日兩國的軍閥與政客才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後，開始致力於推動兩國學生的互訪與交流。雖然這場交流活動最後因為日本政府阻撓而夭折，然而其所激起的水花卻是動人的。96 年後的今日，以吉野作造作為論文主題的筆者，也踏上跨國交流之旅。此次旅程並不具備如前述般的史詩性背景與使命，能在承平時期的抱持著輕鬆的心態與異國學子交流，或許正是屬於我們這代人的幸運；再者，此次交流的主題之一為臺灣與日本的學生運動，其背後的核心精神正屬於理想主義的範疇，與前述交流契合，可說是國際連帶主義的另一次實踐，筆者參與其中，甚感榮幸。

對筆者而言，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我本身對日本文化有興趣，曾修習日文，而且臺灣媒體與流行文化處處充斥著「日本」的身影；陌生則是因為沒有親自接觸真正的日本，直到此次交流之前，我對日本的理解僅止於間接的接觸與想像。過去許多人總有日本各方面遠勝於臺灣的印象，筆

者多少也對日本抱持著「先進」的想像，然而在實際身處東京與「除魅」後，筆者發現，無論在公共建設、生活機能以至消費水平，臺灣與日本並沒有明顯差異，至少都市硬體方面並不遜於日本。個人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繼續作為亞洲地區綜合水平最高的國家，原因在於長期發展所形塑的「人」的素質。這一素質不僅反映在當地服務業極為優異的水平上，也展現在一般市民階層普遍的公德心，雖然臺灣在這方面相對於過去大有進步，但筆者以為日本仍是值得我們學習與自我勉勵的目標。

活動期間，我觀察到，雙方學生因語言關係難以深度對談，但仍努力運用自己有限的中日文能力對話，耐心地設法以更簡單易懂的方式溝通，包容對方在語言上的錯誤；完全不懂日文或中文的同學，也努力地以英文交談，這種敞開心扉傳達與傾聽彼此想法



▲2014 年 7 月 27 日參訪憲政紀念館前，在國會大廈前合影



學術交流

的精神，正是交流的真諦所在。不過，礙於雙方都無法完全掌握對方語言，且日本學生參與學生運動的人數相對較少，因此本來作為此次交流主題的「學運」，討論時主要是本系學生的單向經驗分享，稍嫌可惜。然而藉由此次發放的閱讀資料，與老師在課程中的講解，我們得以了解日本今日社會運動的概況；經由翻譯，早大師生也能多少了解我們身為學運參與者的看法，這次交流著實足以作為了解彼此的敲門磚。

梅森老師於第三日晚會中的一句話，或許最能作為本次活動核心精神的註腳：「這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臺兩國學生首次平等交流。」雖然此話有誇飾色彩存在，但他想傳達的訊息卻是真誠的——近代以來，臺灣與日本處於殖民地及殖民母國的關係，雙方人民難以平等對話，而這正反襯出今日兩國學生交流的可貴——正因為地位「平等」，才可謂真正的「交流」。事實上，臺灣脫離日本統治時代至今，尚未走出後殖民困境，而日本部分保守人士也仍以從屬地或教化地的眼光看待臺灣，凡此均導致精神不對等結構的繼續存在。此次以年輕人對話為中心的交流若能持續進行，對於消除今日仍存在於臺日兩地間的精神殖民結構有所助益，期望雙方未來建立一個真正健康而平等的臺日關係。

總結而言，此次的交流之旅，對於志向是研究東亞區域歷史及近代民族主義的筆者而言，收獲良多。12月舉辦的第二場交流，將由我們善盡地主之誼，期待雙方能交流出更多火花。

廖權修（臺大歷史系 R02 碩士生）

本次交流，適逢臺日政府當局皆因高度爭議的政治決策，民間社會藉由激烈的抗爭行動以表達不滿，此二者不僅影響雙方國內的政治生態與人民觀感，也觸及後冷戰格局下東亞秩序的微妙平衡。正如史家 Edward Augustus Freeman 所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今日的歷史」，雖然參與交流的兩校師友對臺日雙方所經歷的社會動盪有著不同程度的認識，卻因當事人曾經實際參與的「當代事件」仍持續發揮作用，使得吾人既得以「過去事件」的角度進行歷史梳理，亦能秉持「現實行動」的關懷予以反省。是以，當代臺灣的「反服貿抗爭」、當代日本的「集體自衛權解禁」便能和日本戰後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產生跨越時空的連結。此次學術交流，使臺日雙方不囿於學理探究，得以在切身有感的基础上對話，在比較異同的過程中增進自我批判，參考經驗而後修正路線，故可見其意義獨具。

臺灣社會在3月中旬因應「服務貿易協議」的通過，爆發藉由佔領立法院為手段的激烈抗爭。隨著抗爭行動成功，運動本質逐漸由單純的學生運動，轉變成涵蓋社會各階層與族群的「公民運動」。由抗爭行動形成的公民教育機會，也進一步破除臺灣人民對於政治的傳統想像，亦即不再單憑公職人員選舉來界定民主，也不自我限縮政治參與的機會，而是肯認積極參與以監督由政黨主導



的政策決定過程。從上述「公民再教育」的視角來理解「反服貿抗爭」，正是因為國民黨立院黨團僅用 30 秒通過「服貿協議」，以及行政院、立法院和國內主流媒體對此舉「視為合法」，激發群眾對於「服貿協議」通過即將成為既定事實的危機感，這股不可逆轉的擔憂情緒意外開啟了日後近月餘的抗爭序幕。與早大師友對談後，瞭解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事件及其抗爭，方才意識到「不可逆轉性」和當下採取行動的意義何在。縱使安倍政府的決策逾越了民主、法治等普世肯認的核心價值，也引起周邊國家高度關注，日本社會卻未發出相應強度的反對聲浪，容或存在自焚的激烈抗爭，仍未見如臺灣對「服貿協議」之不可逆轉的擔憂。其結果便是無論日本官方或民間社會，皆肯定內閣決議來變更憲法解釋已成為事實，臺日雙方的抗爭結果成為強烈的對比。

安倍晉三透過「內閣決議」的方式，解除日本憲法所載明的「集體自衛權」限制，使得日本自衛隊不僅可用於國防自衛，也可

用來阻止他國遭受攻擊，亦即日本可以在本國不受攻擊的情況下，行使其「防衛能力」。安倍內閣的「閣議」極具爭議，關鍵在於此涉及法治與程序民主的維護、東亞外交平衡、和平憲法與國家正常化等課題。首先就法治與程序民主而言，安倍晉三透過內閣決議變更對憲法的解釋，此舉規避了修憲所需的高門檻（三分之二的議員與過半數公民贊成），也避開人民監督，嚴重違背憲政民主國家的基本精神，若默許此舉，可能成為日後行政權恣意擴張的先例。其二，戰後日本長期接受美援與軍事武裝，故能迅速恢復經濟實力，並且成為美軍在東亞最重要的軍事盟友。隨著中國自上世紀末開始崛起，東亞各國尋求中美強權角力下的新平衡，而日本自衛權的解禁也被視為防堵中國軍事擴張的戰略布局。第三，由於日本戰後的國家重建係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為保留天皇作為國家象徵的存續，新憲法的第九條明定放棄軍事戰力，是為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然而，韓戰爆發以後，為了與中國、北韓等共



▲憲政紀念館一樓設有議場體驗區，臺大與早大學員模擬議員開會實況（2014年7月27日攝）



產勢力相抗衡，美軍決意扶植日本成為軍事夥伴，因而確立了對於憲法第九條的解釋，即日本雖放棄戰力，但仍保有防衛國土與人民安全的防衛力，此成為自衛隊設置的法源。今日安倍所變更的憲法解釋，正是針對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而來，目的實為「國家正常化」。由於日本係受到戰勝者美國的干涉，而成為缺乏軍力且難以變更憲法的非正常國家。故此種「國家正常化」的訴求，不僅包含對美國的反感，也包含以正常國家身分進入國際體系的欲求。

綜上所述，「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涉及多層次的法律、政治和外交爭議。當政府的作為已然侵害保障人民權利的根本憲法，那麼明確地表達批判並抗爭，日本國民責無旁貸。然而，日本的抗爭結果卻與臺灣迥異，使得吾人不禁好奇何以當代日本的民間社會無法凝聚出強力的抗爭能量？在這個問題意識的引導下，安藤丈將老師撰寫的《日本新左派運動：給公民社會的遺產》，清楚梳理戰後日本的歷史脈絡，也嘗試解答當代日本社會運動的困境所在。安藤老師指出，1970年代群眾開始意識到既有體制的僵化以及人民日常生活的「規訓化」，故運動參與者反省影響政治的方式，不再侷限於制度和政策面的干涉，逐漸轉向個人內在思維的改變，或可謂不單從宏大的國家與政府層次理解「政治」，而是從日常生活的視角切入，故有新左派運動的「日常性的自我革命」。伴隨此種新觀念，運動參與者採取暴力形式的直接抗爭，並且以肉體犧牲來評斷個人內在轉變的程度高低，成為自我革命的極端表

現。然而，不受節制的暴力抗爭得不到地方居民的支持，導致社會運動承受大眾的負面評價，無法產生左右民主發展的重要動力，也失去當代動員群眾進行抗爭的能量。此外，日本新左派錯失了藉由公民運動的能量以改變政黨政治的契機，使得財閥政治的結構延續至今。民眾對於政治的冷漠與無力感，大眾的「非政治化」傾向愈加強烈，終於導致當代臺日抗爭結果的極端對比。

參考安藤老師對戰後日本新左派運動的分析，反思當代臺灣「反服貿抗爭」，應可從理解政治的新觀點、社會運動的新型態等面向展開。首先，「反服貿抗爭」突顯臺灣社會正在形塑新的政治觀，亦即在政黨角力與代議政治之外，個別公民都能感受到「政治」並非遙不可及，從日常生活的每個面向亦可發揮作用。臺灣社會也在重新思辨「民主」，此表現在民主與法治之間的價值權衡、大眾參與的審議民主作為政府決策的補充，此皆體現新的民主觀念正在形成，以及不同世代之間對於民主認識的差異。其次，「反服貿抗爭」破除了街頭運動的暴力形象以及運動參與者受到政黨操控的迷思。參與者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主張來自我約束，使得新世代的年輕人重新看待社會運動，原先畏懼政治色彩的社會大眾也能相對清晰地聚焦在議題本身。此外，抗爭過程廣邀學者於現場進行演講，並搭配流行樂團演出，形成殊異的街頭運動文化樣態，或可以安藤老師所謂「享受運動」的觀點來理解之。如以上述兩點反思角度為起點，則能夠對照日本新左派的失敗經驗以進行自



我質疑，其一是如何避免直接抗爭行動的負面評價，其二是新的公民運動能量如何成功引入體制內政治，促使既存的政黨政治有所修正，凡此為吾人需要持續思索的課題。

本次交流過程中，臺灣學子紮實地得到日本作為先行者與旁觀者的批判與建議，吾人也在闡述自身觀察的同時，感受到作為運動參與者在視野上的侷限。此外，正是在日本的歷史經驗與當代議題的參照下，體認到「反服貿抗爭」的意義所在，不僅捍衛了臺灣的民主價值，更提供日本、香港等東亞地區刺激動力的示範作用。是以，梳理歷史脈絡使得吾人得以更清楚認識當代政治議題，跨域的比較使得批判與反思更具深厚力道，不啻為本次交流最大收穫所在。



▲2014 年 7 月 27 日參觀江戶東京博物館

胡安美（臺大歷史系 B99 學生）

2013 年筆者秉持著對相關領域的興趣，成為第一屆赴日參訪的學員，今年有幸以行政助理的身分，陪同系上老師與學員再次赴日。出發前曾有人問我：參訪行程與去年近似，交流對象同樣是若林老師與梅森老師班上的學生，會不會因此較無新鮮感？我毫不猶豫的回答：一點都不會，因為不同的時間點永遠會有不同的收穫與發現。

用心找「新」——二度參訪早大的視角

第二度與若林、梅森兩班的學生相會，多了一些新面孔，不變的是，大家對臺灣研究所抱持的關心。由於今年雙方各有不少通曉中、日文的同學，再加上前一年的交流經驗，大家很快就能進入暢所欲言的交流狀況。除了和舊識交流這一年來在各自研究領域的收穫，新朋友們亦樂於分享彼此對臺灣、日本研究產生興趣的緣由。向他人闡述的過程裡，無形中也促使自己再次整理內心思路，並透過對臺灣及日本的觀點交流，激發出更大的學術共鳴。

校園導覽時，得知現今早大總圖書館原為棒球場時，加入一些電影《KANO》的話題，似乎又多了些被激盪出的臺、日共鳴！

來到著名的校園景點之一——坪內逍遙博士的紀念像，聽到跟紀念像握手必能成功考取早大的傳說時，不例外地引起了眾人的興趣。去年初次聽到這個傳說，我只是在一旁對導覽者的親身成功經驗嘖嘖稱奇，今

學術交流

年不同，過去一年涉獵了日本文學史，對坪內逍遙與森鷗外在明治 20 年代的「沒理想論爭」印象格外深刻，意識到早大即是這場驚天動地的文學論戰基地時，一股崇敬感油然而生！當我趨前握住紀念像那富有傳說意義的右手時，視線由下而上流動，比起合格與否的祈願，我更深刻體會到的是，為紀念坪內逍遙在日本文學界的成就，於此立像供後人瞻仰的感動。

你的 1968，我的 2014

——集中講座課程與討論

集中講座的主題以戰後日本的學生、社會運動為主，恰逢 2014 年 3 月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雙方學生皆對此議題興致勃勃。若林老師在開場白中提到，他希望有機會談自己的學運經驗，但這次要留更多時間給雙方學生討論。安藤老師詳細剖析 60 年代的日本人基於對二戰的深刻體悟，冀求和平、反對戰事再起的共識，成為支撐社會運動的基底；木下老師作為研究日本社會運動的學者，時常到現場親身觀察，和我們分享他近幾年的觀察所得，木下老師曾於 3 月到過太陽花學運現場，引發臺大學生爭相詢問老師的看法。

此次雙方學生討論的面向主要有三點：一、早大學生詢問臺大學生參與學運的經驗談；二、臺大學生對何以現今日本大學生較少參加社會運動的疑惑；三、學運與社運能帶給國家社會的未來願景。此次參加交流的臺大學員皆有關注太陽花學運，故從 3 月 18 日佔領立法院的緣由、自議場向外擴

散的響應串連活動，乃至對此次學運的意義定位，臺大學員鉅細靡遺地侃侃而談。早大學生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是，對多數年輕人而言，日本 1960 年代的社運雖如火如荼，但它終究無法跨越限制，當時的訴求未能如願，以失敗告終，未實現的挫敗感致使後代年輕人認為，就連上一代人都這麼努力過了，或許證實社運不是一條改造國家社會的可行之路。有的早大學生亦表示，在他們成長的教育背景下，學運或社運似乎代表著某種負面標籤，因此年輕人除了鮮少參與，也不會在同儕間作為話題談論，一旦貿然提出，反而會有打破此一潛規則的尷尬風險。

作為來自臺灣的年輕人，我能理解早大同學所說的那種鑑於上一代失敗而無法繼續努力的挫敗感，也能理解日本文化中避免破壞和諧氣氛的人際關係法則，卻仍無法理解日本的年輕人為何能「看似」失去對學運和社運的信心；反之，或許得自問何以臺灣的年輕人能繼續對學運和社運抱持信心？透過兩方觀點的差異比較回到第三個問題——學運與社運能帶給國家社會的未來願景？臺大同學多半認為即便太陽花學運沒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但它激盪出一個好的開始，無論是大眾對社會議題的關懷，或對於國家政策的關心。我也是打從心裡抱持著這樣的盼望，但同時也不停反芻著安藤老師所言：「當學運和社運成為一種體制化的運作，是否意味著此運動形式終能發揮最有效的影響？」雖然當下我的知識量並不足以回答這問題，但透過這次討論激盪出的內容，期待不久的未來能對此有完整的思緒理路。



如同去年，當五天四夜的交流在歡送會劃下句點時，我們在早大同學的精心準備中交織著歡笑與不捨的情緒。儘管相處的時間很短，但它是一個幫助雙方學生促進對臺、日了解的長遠契機。對我而言，透過今年的交流活動，不僅實踐了一年自我成長的目標，同時也在與新、舊人事物的相處中，找到了下個關於學術成長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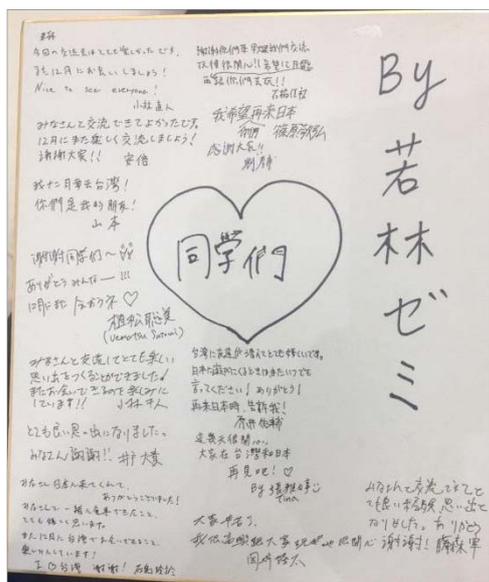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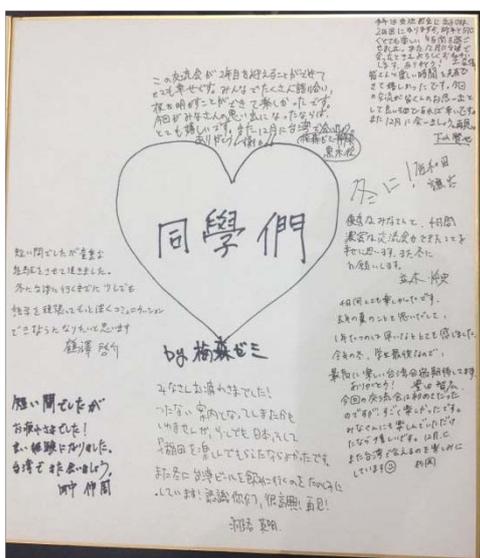
段輝中（臺大歷史系 B00 學生）

「這是自明治維新以來，臺灣人與日本人第一次平等交流」，在第三天的交流會上，梅森老師如是說道，令人不得不沉思臺日兩國相互纏繞糾結的歷史。

第二天參訪靖國神社與憲政記念館。在靖國神社館方的敘事中，乙未抗日（婉窈老師大概會糾正我是保鄉衛土戰爭）淪為日清戰爭中的配角，「1895 年全島悉數平定」一語道破帝國亟欲透過戰爭、殖民、領土擴張彰顯其強國的榮光，然而榮光底下的陰影，包括新竹地區的焦土作戰等，皆在帝國的偉大敘事中無影無蹤。殖民地的拓展成了帝國光環上的寶石。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帝國解放亞洲人民的戰爭，而非帝國為了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所展開的侵略戰爭。遊就館內，展示了帝國富強的一面，彷彿在帝國治下，無一人受傷，沒有民族遭到壓迫一般，就連戰敗的恥辱也抹去，只剩下「七生報國」等語，只剩下對烈士的懷恩。

由此，我稍稍理解中韓臺三國對靖國神社內的歷史敘事不滿的理由，自身民族的不幸變成了帝國誇耀的戰績，也理解梅森老師所謂「第一次平等交流」一語的深意。令人不得不問、不得不思索包含民族與國家、國家與個人、戰爭與和平、民主與獨裁、殖民與被殖民、平等與不平等間的種種問題。

◀梅森老師與若林老師班上同學致送本系學員的感謝卡



之後，參訪了憲政紀念館。在佐奈同學的講解下，更加瞭解戰前日本的憲政發展歷程。由元老院、元老指定組成的內閣、以及與內閣拮抗的帝國議會、各殖民地總督等機構，在天皇之下，結合成戰前的日本帝國。這樣的體制有些像各政府部門互不隸屬、權力分立的總統制，但也造成各部門的爭執皆需訴諸天皇敕令才能平息的政治困境。而大正時期，內閣不斷尋求制衡軍方及元老的權力，尋求擴大自身的民意基礎，解除對投票資格的限制，確保民主主義的推行。不過，大正時期對民主主義的追求，在軍方崛起的1930年代遭到重挫。1920年代晚期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下，人民對準民選內閣失去信心，轉而投靠高喊對外擴張的軍方。於是，《治安維持法》的通過替戰前的政黨政治敲響喪鐘，五一五事件刺死了政黨政治。

臺灣人對民主的覺醒，同樣在日本明治晚期與大正初期，和高唱民主主義的板垣退助等人結成一氣，也於30年代中遭到壓迫。最終，在「國家」的旗幟下，個人被犧牲，日本走上戰爭之途。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被捲入一場荒謬絕倫的「解放」戰爭裡，構成在靖國神社裡看見的帝國史詩。

那麼戰後的日本又如何呢？今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是否串起臺日兩國國民對民主主義的省思呢？集中講座從太陽花學運反思日本的社會運動史。安藤老師認為，想要瞭解戰後日本發生的社會運動，必須面對民主主義的本質為何的問題。木下老師則解釋經濟發展與社會運動間的關係。就兩位老師的說法，在日本，社會運動變成了生活方

式之爭，是向政府與民眾宣傳運動者生活方式的手段。而安藤老師更關注社運對運動者生活的影響。就此來說，我覺得在臺灣，人們無法逃離政治，不論是誰，都必須思考兩岸關係、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在日本，個人可以拒絕政治或社會運動進入生活，享有小團體的一方天地。於是，參議員選舉能當作理念宣傳，能當作手段，而改變政治可以不是目的。

臺日雙方的學生就民主、社運兩大主題進行意見交流。在與日本同學岡崎等人的閒聊中，日本學生多認為太陽花學運刺激日本大學生思考是否應該學習臺灣學生的「主體性」（中文應該是能動性）。這是否是客套，令人陷入長考。

在第一夜與日本學生的長談中，我們討論了日本修憲的問題。早大學生解釋日本對修憲的兩種不同立場，一是想要邁向正常國家的修憲派，一是質疑修憲程序問題、擔心捲入戰爭的反修憲派。第三天的講論會中，梅森老師也問了臺灣學生，後太陽花的東亞將走向何方？臺灣的學生也就這個大哉問提出許多答案。而在修憲或講論會的討論中，恰巧皆未談及年輕人在政治中的主體性問題。那姑且事後諸葛地問以下的問題：

未來，亞洲的年輕人將怎樣參與政治呢？日本將走向何方？而臺灣與中國又要走向何處呢？

根據上海交流回來的同學說法，現在中國學生努力思考的是如何將中國打造成富強的國家，汲汲營營於21世紀的中國夢，而非亞洲人民的福祉。從這次前往日本交流



2014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

的經驗，中國是否正走在日本帝國過去所走的道路上？

我想臺灣應該嘗試當東亞的瑞士，參與亞洲乃至世界的國際政治。希望臺灣將來能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各國人民交流的舞台，而非侷限於臺灣海峽的兩岸而已。



▲上圖：早大校園內的手繪版校園地圖（2014 年 7 月 26 日攝）

下圖：實地走訪學生運動開會場所「高田牧舍」

胡煒晴（臺大歷史系 B01 學生）

當初申請參加此次交流活動，目的是想實際接觸日本大學生，了解他們在生活、想法、課業上，和臺灣的大學生有什麼異同。我去過兩次日本，以交流為目的，這是第一次，行前除了安排自由行的行程之外，也試圖閱讀本次課程的相關資料，並回想 318 學運時的種種，期待與日本同學分享。

我對早稻田大學校園內處處充滿了象徵早稻田的「W」圖案，印象特別深刻（早稻田的日文發音為 Waseda）。這個別出心裁的設計，讓我感受到早大用心經營校園景觀，與師生以身為早稻田一分子為傲的精神。反觀臺大，校園內似乎沒有這種象徵性圖案。早稻田是日本學生運動的重鎮，這次我們實地到當初學生運動分子時常開會的場所——「高田牧舍」。回國後查詢得知，高田牧舍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有些關聯，深富歷史意義。

本次交流活動的時機正好切合臺灣上半年所發生的學運，因此早大教授的講課主要以日本的社會運動為主。其中安藤教授在介紹日本反核運動時，提到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瓦解後，社會上形成一股對於便利生活的反思，這波反核運動的要角曾試圖參選，但終告失敗。這回應教授之前所講的「有限的制度化」，進入體制內並不容易，就像臺灣學運即使引起了眾人矚目，並向政府提出強烈要求，但目前看來，政府似乎沒有做出



學術交流

相應的回應，這是不是每個運動過程中都會經歷的無助呢？況且要持續一場運動的熱度並非易事，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能夠向當局傳遞運動者的心聲並制定讓多數人接受的政策呢？我想這些都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在得到大眾關心之後所要思考的問題。此外，政府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經濟、生活環境和人生哲學、價值觀，孰重孰輕，在多元意見的民主社會中，都考驗著執政當局的智慧。

討論會時，臺日雙方同學踴躍發言，毫無冷場。我發現臺灣學生對於學運本身的脈絡掌握得相當清楚，而且能夠延伸出其他問題，如世代之爭、轉型正義等等；日本學生

的發言比較少，但也分享了一些不同於臺灣學生的想法，這才是討論會所要的互動。不過本次講課主題日本社會運動的討論相對較少，希望 12 月在臺舉辦的交流會能夠針對這方面多加探討，畢竟交流重在分享雙方經驗，從中互相學習。

整體而言，本次的交流帶給我不同於旅行的體驗，有時候我們在同一個思考框架太久，易於疏忽一些小細節，多聽聞別人不同的想法，有助於跳脫出原本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得以新視野去觀看問題的本質，我想這就是本次交流給予我最大的衝擊。



▲2014年7月29日歡送會後，雙方學員大合照

